

雁北党史资料丛书之二

塞上风云录

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

塞上风云录

(二)

主 编 刘福斌
责任编辑 景 京
 乔志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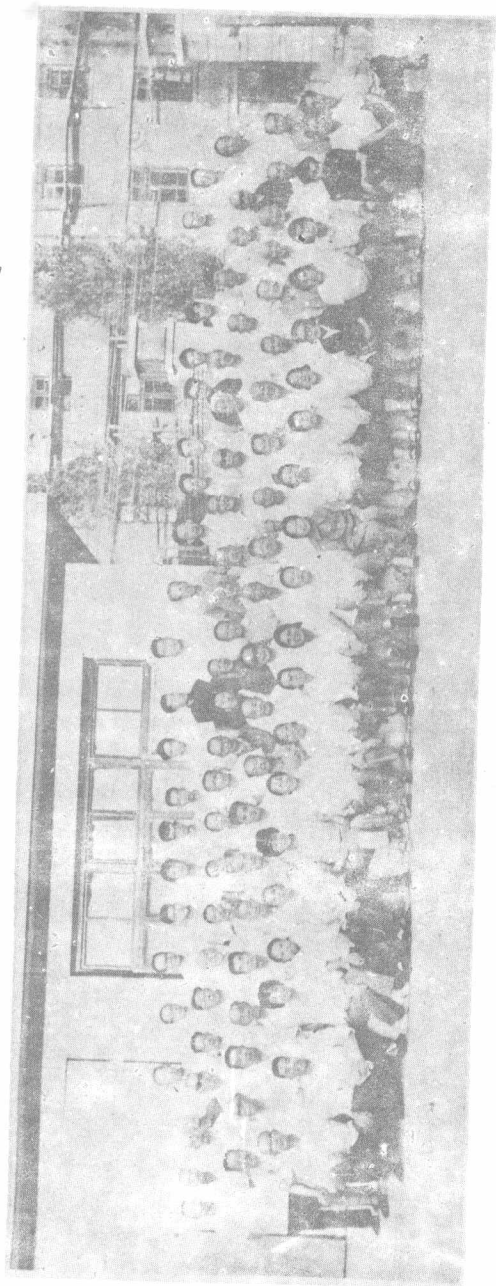
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

(内部发行 注意保存)

开本: 25K 字数: 270千字

1987年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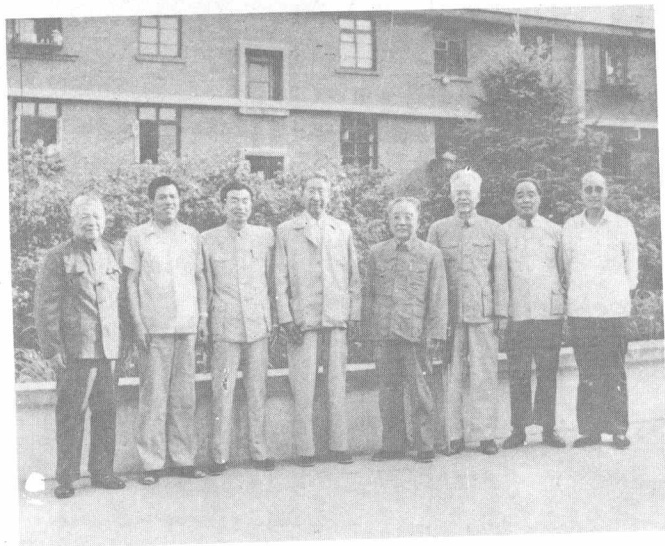
大同日报社印刷厂印制



1983年8月山西省委书记李力功同志和雁北地委行署领导人与参加晋绥雁北地区党史工作座谈会的全体老同志合影留念。



1984年8月，参加雁北地委在兰州召开的党史专题座谈会部分老同志合影。



1986年6月雁北地委部分领导与原在雁北战斗、工作过的老领导合影。从左到右的姓名是：屈健、赵生荣、石磊、杨植霖、李登瀛、张一平、张正书、高树华。

编 者 的 话

《塞上风云录》汇编的是曾在雁北地区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本室出印的“雁北地区党史资料丛书之一”，系抗战时期晋察冀雁北地区回忆录专辑，本书为抗战时期晋绥雁北地区回忆录专辑。

本书共选编了29篇文章，文字近25万。因篇幅限制，还有一大批回忆录未能囊括进来。为此，我室决定，在今后将分专题继续汇编出印。

在汇编本书中，为求得史实的准确，我们除把选编的每篇文章退还给本人，作进一步校订核实外，本室对部分文章的部分段落还作了较大的加工整理。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因此在编辑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切盼读者予以指正。

我们在汇编本书中，得到一大批老同志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

1987年 月

目 录

雁北战争年代的回顾·····	李登瀛 (1)
抗战初期在雁北革命斗争的回顾·····	屈 健 (19)
关于抗战初期雁北工作的估计与检讨 ·····	<u>赵仲池</u> <u>姜 胜</u> <u>郑 林</u> 屈 健 (31)
晋绥雁北地区反顽固斗争概述·····	屈 健 (41)
忆一二〇师独立六支队在雁北绥南抗战·····	刘华香 (54)
驰骋晋北 歼灭敌寇 ——忆抗战初期的358旅·····	赵兴勤 (74)
战斗在塞上的警六团·····	高学贵 (92)
警备六团在塞上战斗片断·····	韩创业 (107)
坚持雁北绥南抗日游击战的警备六团·····	杨克林 (121)
人民战争的凯歌 ——忆雁北军民粉碎日军第十三次 大扫荡和碉堡公路政策·····	谷奇峰 (130)
屹立在洪涛山区的一支武工队 ——忆右南根据地的一段反“蚕食”斗争·····	康 庄 (135)
一场壮观的人民战争 ——朔平根据地45天反“扫荡”战斗回顾·····	石 磊 (143)

开辟神朔抗日根据地的回顾……………饶 兴(149)

一把尖刀

——忆358旅工作团深入敌后的斗争……………裴周玉(156)

我在大(同)怀(仁)工作的回忆……………苏 兴(171)

坚持大怀左地区抗日斗争之回忆……………杨明正(176)

开辟马头山和弥陀山抗日根据地斗争回顾……………王士英(180)

洪涛电波

——关于晋绥边委会电台工作情况回忆……………李德全(187)

在严峻的岁月……………石生荣(196)

回忆朔县前期之抗日斗争……………侯建华(229)

关于朔县抗日战争初期斗争情况的回忆……………张鹏举(251)

记抗日初期的朔县动委会……………刘选伍(259)

抗战初中期朔县党的建设的回顾……………王 伟(270)

忆朔县动委会宣传团……………任重捷(284)

朔县五区反顽斗争的回顾……………戎存仁(289)

李林——我永远怀念的好大姐……………肖 康(295)

赴雁北工作和左云城暴动脱险回忆……………王海之(301)

难忘的宋家沟事件……………王 琳(307)

在抗战初期的岁月里……………朱子明(316)

雁北战争年代的回顾

李 登 瀛

雁北，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抗战初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在1941年前，这个地区曾叫“晋绥边”地区，除包括西雁北各县外，还管辖毗连雁北绥远南部的凉城、和林、清水河和丰镇四县的一部。如果说晋西北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的门户，那么雁北就是晋西北北部的屏障，是党中央和晋西北联系绥蒙的走廊，也是党中央联结晋察冀的通道。这里有著名的古文化遗址云岗石窟，有闻名中外的煤都大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十分重视这个地区，妄图建立第二个伪满州国蒙疆区，把它作为自己可靠的后方补给点和反共基地。阎锡山更是不甘心失去这个战略要地。这就形成了我们与日伪顽长期争夺这个地区的艰巨复杂的斗争局面。

为了使问题集中一些，我对雁北战争年代的回顾，从1937年成立中共晋绥边工作委员会开始。这是因为，从这个时候起，党在雁北领导的抗日群众运动、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等工作，才有组织、有领导、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并一直持续到最后取得全面胜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以前，也就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的前夕（即是年的5月），以牺牲救国同盟会总会的名义，曾派出阎秀峰、苏谦益、李林、张干丞、屈健、武养民等27位同志（多数为共产党员），到雁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根据中共山西省工委的决定，还组织了以阎秀峰为书记，侯富山、李林分别为组织、宣传委员的中共雁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以吕调元为首的牺盟大同中心区委会。到雁北的这批同志有10多名被分派到西

雁北的朔县、平鲁、山阴、左云、右玉、怀仁等县，他们在抗战初期的开创工作中，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提到的。“七·七”事变后的9月上旬，由于形势的变化和需要，阎秀峰等同志相继撤离大同，中共雁北工委和牺盟大同中心区委会随之撤销，一部分同志返回太原，一部分同志坚持留在各县，参加了后来的各项工作。以上是中共晋绥边工委成立之前，我对党在雁北工作的简要介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西雁北的斗争历时13个年头（1937至1949）。按照西雁北的斗争经历和特点，我拟分三个大的阶段汇报。这就是：开创阶段；坚持斗争阶段；全面发展和胜利阶段。

晋绥边特委成立后，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根据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了：广泛地宣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积极的抗日斗争；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疾苦，普遍建立游击队、锄奸队、自卫队组织，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在广泛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当地的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晋绥边地区根据地建设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尽管我们的具体工作中也曾有过一些失误，使工作受到一些损失，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大局还是好的。

（一）关于开创阶段

这段时间，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0年反顽固斗争胜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共3年半。

1937年9月7日，日寇突破天镇盘山晋军防线后，阎锡山的军队望风披靡，全线溃退，其政权也随之瓦解，人员四处逃散，一时日寇的铁蹄，踏遍雁北的大好河山，人民惨遭抢劫、奸淫、烧

杀。这期间雁北被日寇屠杀的无辜群众达五六千人，仅朔县城被残杀近3800人。在此期间，被日寇打散的国民党、阎锡山军队的散兵游勇，也到处残害人民。

就在雁北的人民任人宰割、国土任人践踏的时候，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大批干部，日夜兼程英勇地开赴前线，深入敌后，宣传和组织人民武装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并相继收复了平鲁县城、井坪镇和右玉县城，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配合了正面战场，使人民有了战胜日寇的希望。同时与阎锡山军队的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赢得了人民，于1937年9月中旬，经中共山西省工委决定，成立了以赵仲池同志为首的中共晋绥边工委；同时由牺盟总会任命以梁雷同志为首的牺盟雁北战时工作委员会，并由梁兼任司令部司令。这时随赵、梁一起到雁北工作的同志有刘华香、柏玉生、郭子杰、王平、任晨、李寒等同志。这些同志和原来在雁北工作的李林、张干丞、屈健、武养民、傅生麟、康庄等同志先后会合（共30多人）。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又介绍原在绥远工作的郑林、胡一新同志来雁北工作，进一步加强了中共晋绥边工委的领导力量。接着，积极地开展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

为了积极开展敌占区工作，创建革命根据地，奉党中央的指示，于1937年9月29日，我120师派宋时轮同志率一个主力营组成雁北支队（雁北人民称为宋支队），到达西雁北各县，并相继收复了平鲁城、井坪镇，10月14日，我120师警备六团，由副团长孙超群同志率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从偏关到达右玉西山一带，随即收复了右玉城。与此同时，120师358旅716团于雁门关连续伏击了日军，给了敌寇以沉重打击，有效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在我八路军一系列军事进攻的形势下，中共晋绥边工委和牺盟雁北战时工委，便迅速展开了打击日寇、汉奸和宣传组织抗日救亡的工作，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抗日救

亡的群众组织纷纷组建起来，群众参军和参加地方游击队、自卫队的热情空前高涨，这有力地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12月，经晋西北区党委决定，将晋绥边工委改称中共晋绥边特委，书记仍为赵仲池，组织部长为郑林，宣传部长为胡一新，军事部长王宝珊。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晋绥边特委和牺盟雁北工委的组织和人事，都有过一些变动和充实。从这以后，到1940年年底，我们在大力开展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组建了各级牺盟会组织、带有政权性质的抗日救国会和“动委会”，组建了县级和边区级工、农、青、妇群众抗日救国会组织；组建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发展了党员；1940年反顽固斗争胜利后，在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组建了抗日民主政府，人民武装力量也有较大的发展，除壮大了八路军主力部队外，普遍发展了地方部队和县、区游击军、锄奸队。120师独立第六支队的成立，使我们有了地方武装部队，在我宋时轮支队东进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为建设、巩固雁北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民武装力量和各项工作的发展，鼓舞了人民，也引起了日寇的惊恐。从1938年8月开始到1940年年底，日寇对我晋绥边根据地中心地带，先后进行过13次大的军事“扫荡”。从1939年开始，敌人除大举“扫荡”外，还开始用修公路、设据点的“蚕食”办法，妄图分割和缩小我活动范围，最后达到消灭或赶走我们的目的，敌人的“扫荡”虽每次都被我粉碎，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成百上千的干部、战士为祖国、为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梁雷、李林、曲小峰、王默平等同志，就是在这段时间牺牲的。敌人是极其残暴的，在每次“扫荡”中，日寇除攻击我武装力量和抗日团体外，对根据地的人民还施行残无人道的“三光”（烧杀、抢光、杀光）政策。成百上千的无辜群众被杀害，妇女被奸淫，房屋、棚舍被烧毁，牲畜财物被抢走……。敌人的

暴行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损失和困难，也给我们工作上增加了困难。但由于有党的领导，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日寇的暴行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抗日怒潮。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自觉性更高了，同日本强盗血战到底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也就在这个时候，阎锡山的顽固势力也蠢蠢欲动，想从人民手中夺取果实。1938年冬季，阎锡山先是委派杨集贤为第十一专员公署专员，随即委派了“敌区办事处”主任和各县的县长，并配备了一些武装力量，这些人员先后到达雁北开始同我们进行“磨擦”，限制我们的发展。进而又下令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各抗日人民团体，妄图孤立我们，困死我们，赶走我们。这就形成了日伪向我夹攻的局面。但是，我们并没有被日伪顽和顽固势力的气势汹汹所压倒。相反，我们一方面同顽固势力的上层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发动群众与顽固势力进行反限制、反“磨擦”的斗争，使顽固势力的各种政令基本上寸步难行。由于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经过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之后，不仅战胜了日伪顽的夹攻，而且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并于1940年初，彻底摧毁了顽固政权，第一次建立了完全属于人民的抗日民主政府。人民政权建立后，进行了“四大动员”，有力地支援了战争。至此，雁北地区的政权便完全回到了人民手中，以“南山”为中心的各县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发展。

1940年8月，我雁北的地方部队和各县区游击队以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积极参加了“百团大战”，不断出击同蒲铁路北段沿线的敌伪据点、车站，破坏铁路、桥梁、电话线路，给我军主力以有力地配合，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在参加百团大战的同时，我们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反修路、反设据点的破击战。

以上是对雁北斗争第一阶段的简要叙述。为了更集中地了解这段斗争史，我根据赵仲池、郑林、姜胜、屈健四同志写的总结材料

和雁北党史座谈会同志们共同的认识,对这段斗争史作如下小结。

第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地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的疾苦,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在人民群众普遍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建立牺盟会、动委会和工农青妇各抗日救亡团体。这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政权建设以至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一句话,有了人民,就有了一切,根据地的建设就有了可靠的保证。这个阶段,我们根据地和不被敌人支配的游击区,包括雁北、绥南10个县的部分范围面积约两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万。

第二,广泛地组建群众性的地方游击队、锄奸队、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伪、汉奸的嚣张气焰,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并在斗争中使自己得到锻炼,逐渐壮大自己,提高自己,凡是有我们党委、牺盟会或动委会组织的县份,都普遍建立了游击队等武装组织。

第三,广泛吸收积极分子和进步知识青年举办训练班,培养大批干部。数百名干部经训练后,担任了县区各种领导职务,适应了工作发展的需要。

第四,在武装部队、各抗日团体和人民群众中,有计划地发展党员,组建党的各级组织,这些组织一经组成后,又成为领导人民坚持斗争和进行根据地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个时期,我们大约发展了2千多名党员,建立了百余个党的支部委员会,各县都建立了党的县委或县工委,各县共建立了16个区委会。

第五,重视政权建设工作。抗战开始时,大力组建抗日救国会或战地动员委员会,行使政权职能。在反顽固斗争胜利后,迅速召开各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从专员公署到各县区,普遍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各级政权建立起来后,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加强了根据地建设。

第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吸收当地有影响的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参加牺盟会和动委会,在反顽固斗争胜利后,又吸收

他们参加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

在这一阶段中都有些什么缺点、失误和不足之处呢？按前述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重视了公开的、正面的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这当然是对的），但忽视了扎实的隐蔽斗争，特别是对党的建设保密不够，党员过分暴露，以致后来增加了他们存在的困难，这给我们的斗争也增加了困难。

第二，在初期阶段，由于对游击战争缺乏经验，往往在敌人扫荡时，把毫无战斗力的各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与敌周旋，以致遭受敌人的围攻，这是几次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直至敌人的第九次“围剿”之后，我们才变得聪明起来。

第三，在对待地主、富农方面有过“左”的行为。“四大动员”从总体上讲，在物资上支援了战争，使我们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力量，但在具体做法上有“左”的行为。这些“左”的行为，引起了一些地富逃跑，虽经纠正，后来还是有少数坚决与我为敌。这种树敌过多的做法，无疑给我们增加了斗争中的困难。

第四，与上述“左”的思想相连，这段时间我们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据赵仲池等同志的材料记载，几年来我们共杀了二百名左右的人，这显然杀多了。有些人本来是可以争取的，我认为其中免不了还会有杀错了的。这种“左”的行动，后果当然是很不好。

（二）关于坚持斗争阶段

这段时间从1941年到1945年日寇投降前，共4年半。在此期间，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巩固其占领区，先是进行军事、政治、特工的策划工作，进而对我根据地发动了全面的进攻。除军事进攻、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外，反复施行了所谓的“施政跃进”运动和蚕食政策，大批组建、利用伪军，收买民族败类，捕

捉我党员和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妄图动摇瓦解我军心民心。从1941年底开始，我们的根据地逐渐缩小，我们的中心地带（右南、山朔）一度放弃了，我们内部连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分子和曾担任过我重要职务的投敌叛徒，我们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1年春，根据晋西区党委的指示，晋绥边特委改为晋绥边区第五地委，胡全（阎顾行）同志接替了赵仲池同志的地委书记。这年的敌我斗争形势，从表面上看，还是同1939年、1940年那样，各项工作都是向上的，敌人的军事“扫荡”不象过去那样频繁，显得比较“平静”。当时我们分析日寇要南下打太平洋战争，必然要抽调大批兵力，会对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革命的大发展时期就要到了。这年的5月，晋西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成立第五军分区，由郭鹏同志任司令员，胡全同志兼政委。这年的8月，晋西区党委又决定，五地委分为5、9两个地委，并在地委之上又建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这个工委的成员共5人（阎顾行、郭鹏、郑林、胡亦仁、李登瀛），五地委书记由阎顾行兼，九地委书记由郑林兼。这时五专署分出一个“东区办事处”，归九地委领导，代行专署职权。办事处主任为武养民同志。在第五军分区成立后，当时强调建立正规的武装部队，除独立第六支队的步兵二、三营和骑兵营外，又把各县游击队的大部集中起来，组建为第四营（后来三营调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党中央的战斗），军分区组建了比较庞大的司、政、供、卫各部和警卫连。为了开展敌占区工作，军分区还组建了两个强有力的武装工作团，抽调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亦民和骑兵营教导员谷奇峰分任团长，深入到大左及右玉接敌区和敌占区工作。总的讲，1941年我们的环境还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初，随着敌人策划扑灭我根据地抗日力量的准备基本就绪，日寇向我发动了连续的更为毒辣的进攻。这时叛徒在日寇的进攻中起了极坏的作用，也由于前些时候我们对敌人判断上的错误，对县区武

装力量的削弱等原因，对敌人的这种攻击未能采取得力的措施，显得非常被动，布局上有些错乱。尽管我们做了极大的努力，最后还是不得不先从右南，后从山朔撤退。这时除右玉东、西山，大左和朔平根据地外，原来的中心地区不得不暂时放弃。在形势急骤变化之后，我们又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从组织上又将五、九地委合并为五地委。撤销了雁北工委，第五军分区也同时撤销。此时，地委根据形势的变化，曾确定以“精干隐蔽，维系人心，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方针，组织一些骨干利用社会关系，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有的还打入敌人内部。还有一部分身体不好的同志调后方工作或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1943年8月，根据当时形势，上级党决定，集中各级干部学习整风文件和进行整风。这时根据晋绥分局指示，五地委与塞北工委合并，雁北各县工作由塞北工委（即原绥蒙区党委）领导，阎顾行同志调任工委副书记，我到工委任社会部副部长。当时除朔平仍留有干部继续坚持工作，和已完全“职业化”的同志未动外，右玉东、西山和大左等地的同志，全部调回塞北工委所在地偏关参加整风，原五地委的干部编为一个队，整风学习对提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肃清王明路线的影响，对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整风后期审干阶段，由于执行了康生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方针，发生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同志。好在时间不长。1944年春整风运动结束，后来经过甄别，绝大多数同志很快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少数同志留教导队一面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荒种地克服困难，一面继续进行甄别。尔后又回到工作岗位。塞北工委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决定组建朔平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朔平以至雁北其它县区的对敌斗争。同志们回到工作岗位后，积极响应毛主席“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劳武结合”和“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在塞北工委的具体部